

热历史

古代人口梯级增长

□陈忠海

中国的人口总数由商周时期的千万左右发展到清末的4亿,其过程并非等量增长,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和爬升,重要的梯级有1000万、5000万、1亿等。造成人口梯级性增长的原因,除政治、军事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外,经济因素无疑更为重要。

千年徘徊

先秦时期的人口总数一直处在低位徘徊阶段,据赵文林、谢淑君《中国人口史》,夏代的人口约1300万,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,到战国末期仍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,秦统一时人口总数估计为2000万左右。2000年的时间可谓不漫长,但人口总数却基本保持了稳定,原因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的约束。

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,出现了粟、黍等被驯化栽培的农作物,青铜农具代替了石质农具,又初步掌握了物候知识和天文历,农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,为养活上千万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。但总体来说,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还处在粗放和落后阶段,作物品种单一,青铜农具存在很多缺陷,缺乏水利基础设施保障,生活资料的增长受到极大制约,加上战乱、自然灾害等,人口始终维持在同一水平。

农业突破

中国第一次人口梯级出现在汉代,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,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总人口数达到了5900万左右,西汉末年人口数虽然锐降,但到了东汉初期又快速回升。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,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人口总数为3400万,章帝章和二年为4300万,桓帝永寿三年为5600万。

两汉300多年间人口总数大体在5000万上下波动,较夏商周三代有了质的突破,除了统一王朝带来的社会稳定及战争的减少外,生产的发展,尤其是农业技术的突破性进步是最关键原因。

汉代进入中国传统农业的形成期,农业由粗放逐步向精细发展,农具进入铁器时代,出现了铁犁壁、二人三牛的耦犁及铁耙、耧车、风车、水车、石磨等先进生产工具,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,耕作的速度和质量都大为提高,农作物品种也更为丰富,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的传递,大量新品种农作物被引进,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更加重视,出现了更为精确的历法,这些使得徘徊了200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质的飞跃。

夏商时的粮食亩产量缺少文献记载,《管子》说过“一农之事,终岁耕百亩,百亩之收,不过二十钟”,这说的是春秋时期的产量,亩产0.2钟,1钟为10石,即亩产2石。

汉代粮食亩产量有了突破性提高,《前汉纪》谈及西汉文帝时的亩产:“今夫农五口之家,其服作者不过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。百亩之收,不过三百石。”即亩产3石。



▲夏县介子推文化园展出的农耕场景
记者 刘亚 摄影

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讲五千顷耕地“今溉田之,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”,5000顷合50万亩,即亩产4石。汉末嵇康《养生论》:“夫田种者,一亩十斛,谓之良田,此天下通称之也。”1斛即1石,这里说亩产10石,不过不是粮食的普遍产量,而是“良田”。但不管怎么说,汉代粮食单产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提高,《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》估算,汉代粟的亩产量超过了140公斤。

重心南移

汉代人口达到5000万梯级后又出现了新的徘徊,其间发生的战争固然对人口变化有一定影响,但新的峰值出现后便不再进一步突破,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对人口的支撑作用又出现了新的瓶颈。

魏晋以后国家出现分裂,人口一度出现了波谷,据《中国人口史》推测,三国时期人口总数在1400万~1800万之间,西晋的人口总数约2000万,随后人口出现了缓慢回升,南北朝人口最鼎盛时达到了4200万,隋统一时约为4900万。

从汉末到隋初,人口重回5000万梯级用了300多年,与大一统时期的两汉不同,这段时间国家处在更大的分裂与动荡之中,政权分割,战事频发,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,严重制约了人口增长,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人口总数重新回升,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。

晋代之前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,广大南方地区虽然早已纳入国家版图,但那里地广人稀,多属未开化之地,一直到汉末,黄河流域都是人口密集区,据《中国人口史》的研究,东汉时的公元140年,今河南省辖区内人口约923万、山东省约863万、河北省约638万,而同期江苏省约222万、浙江省约81万、广东省约86万。

从西晋末年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,江南地区气候较闷热,土地肥沃,更适合耕种,北方地区虽开垦较久,但潜力已经不大,且战乱多发,迫使大量人口南迁。据梁方仲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,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,全国耕地面积在6.9亿亩至8.2亿亩之间,如果考虑到统计的误差,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应当大体保持不变,而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,全国耕地面积一下子跃升到19.4亿亩,增加了一倍还不止,多出来的部分,最重要的应该是长期开发江南所增加的。

汉末至隋初数百年的战乱虽然严重削弱了生活资料的供给,但

江南的开发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,所以人口总数才能重新回到5000万的梯级。

结构矛盾

唐宋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,不仅社会相对稳定,而且江南的开发进一步持续,这为生活资料的不断积累创造了条件,在社会总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推动下,人口也在不断增长,到宋朝时人口总数跃上了1亿的新梯级。

在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的情况下,养活1亿人并非易事,除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、水稻等新品种作物的进一步推广外,各地区的均衡发展,尤其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功不可没。据《中国人口史》的研究,南宋时今江西省辖区内的人口达到了1025万,而同期河北省仅为466万,江南地区后来居上。

1亿的人口梯级一直保持到清初,抛开其间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暂时人口下降外,人口总数基本上又稳定了数百年,人口增长出现新的停顿,意味着生活资料供给又出现了新的瓶颈。

在此之前一直强调农业的重要性,但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并非唯一构成,自然经济条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,所谓“生活资料”,也并非吃饱穿暖那么简单。宋、明之间人口出现了新的徘徊,与经济结构矛盾不无关系。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变,意味着供需矛盾出现了新变化,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消费变化更能说明问题。

明朝中期开始,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,一些原本只有皇室、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。

这种“消费升级”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,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不无关联。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工业革命,传统农业已退出经济的主导地位,手工业、服务业快速发展,这种现象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,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。

但是,中国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却没能跟上这个潮流,由于经济政策的保守和失误,明朝在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总体是失败的,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了国家经济90%以上的份额,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升,整个明朝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.3%,不仅经济总供给量不足,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。

《北京日报》

生活史 糖画竟是中药“小甜甜”?



▲永济博物馆民俗规划展展出的小贩卖糖画场景
记者 刘亚 摄影

□周欣怡

在庙会或民俗活动场合里,很多人都吃到过一种黏黏的、甜甜的、淡黄色的液体,它就是用饴糖做的。

饴糖可以用两根小棒子挑起来,纠缠着玩耍,有的地方叫“糖稀”,有的地方也叫“绕绕糖”。

此外,在一些民俗技艺表演里还可以用饴糖吹糖人、糖画。

饴糖是我国古代制作最早、食用和药用最为广泛的人工糖,距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,别名饴、胶饴、饴糖、软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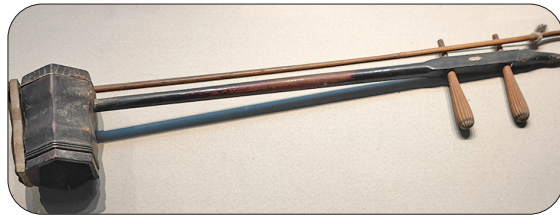
相传“酒圣”杜康将稀饭放在竹筒里成功造出了酒,杜康十分得意,在老婆面前炫耀。老婆不服气,说自己可以使用干饭做出糖。杜康不以为然,老婆却认真起来。她将清水浇湿大麦让其发芽后,捣碎磨成浆,拌在干饭里,再装进瓮槽里,最后瓮里果真冒出了糖水。她再把糖水煮一阵,就成了甜甜的饴糖。

因此,饴糖是米、麦、粟与蜀黍等粮食经发酵糖化制成。饴糖源于谷物,《本草纲目》将其列为上品。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脾胃气虚、中焦虚寒、脘腹疼痛、肺虚久咳、肺燥干咳等症。

《大众日报》

史海钩沉

二胡史话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展出的二胡
记者 刘亚 摄影

□田青

二胡,是现今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之一,但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,这件乐器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,因为名字里带一个“胡”字。据说从唐朝开始,就有一种类似二胡的乐器叫奚琴,“奚(部)”也是北方的少数民族,和鲜卑族有关系。《乐书》中记载的奚琴,不是用马尾弓来拉的,而是用竹片,“两弦间以竹片轧之”。到了宋朝,沈括《梦溪笔谈》里有一句:“马尾胡琴随汉车”。“马尾胡琴”就和今天的二胡是一样的了。

在北方,二胡基本上只是各个民间戏剧的伴奏乐器;在南方,除了一般的娱乐,二胡主要是在民间仪式中作为伴奏乐器。近代,二胡的发展与道教关系密切。道教分全真派、正一派。正一派的道士在民间俗称“火居道士”,他们有自己的职业,或是手工艺者,或是农民,在业余时间给民间老百姓做法事、做斋醮,二胡就是民间火居道士手中的乐器。

大名鼎鼎的“瞎子阿炳”华彦钧,其父就是无锡的火居道士,他的道观叫雷尊殿。华彦钧作为雷尊殿的一个小道士,吹拉弹唱无所不能,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。

中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、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也在无锡出生,从小喜欢音乐,小时候曾经跟一个叫颖泉的道士学习中国的民族乐器,后来也跟华彦钧学过琵琶,但由于华彦钧天性比较自由不羁,而杨荫浏的家庭很注重礼教,所以后来就不让杨荫浏再跟他学习了。杨荫浏不但学过民间音乐,跟当时的昆曲大家吴畹卿学过昆曲,同时又跟美国传教士学钢琴、作曲、和声,所以中外兼通。杨先生成为中国音乐史的奠基性作家,他的两卷本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》,至今仍是所有学习中国音乐史学子的必读书目。

《长江日报》